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

苏长和

【内容摘要】本文对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作了回顾。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通过引进、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促进和补充作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较为注重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吸取资源，以寻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土思想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辩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学科建设自主性意识的提高。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一定的智力贡献。

【关键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特色 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最快也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最为迫切需要的学科之一。之所以这么说，第一，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带动了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第二，与政治学下属其他学科（政治思想、比较政治、中国政治）相比，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过去 30 年中不能说取得成果最多，至少发展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第三，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人的智慧、知识和制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本文内容

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补充、丰富、提高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水平具有积极作用；第三，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学者们自主性意识的增强，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挖掘资源，以应用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正在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趋势；第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以及当代理论的传统资源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间的辩论，这场辩论促进了学科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当然，尽管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但是，这一发展与国家日益参与国际社会所需要的更高层次的理论和知识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流派之一，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统率性的作用，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占有主导性地位。

按照有的学者的概括，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取得飞快发展，具体表现在：(1)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介绍和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论著数量最多，范围最广。(2)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的国际关系教材和论著最多；而且，中国学者突破传统的教条式和单一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当代国际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最多元化。(3)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队伍建设发展最快。^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畴包括：^②

(1) 关于时代特征的认识。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虽然局部冲突不断，但是不大可能爆发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以及世界性战争，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前世界的潮流，以此为背景，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① 详见李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王逸舟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5-200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1-62 页。

^② 如李滨所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范畴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等。

(2) 关于国际秩序的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占据国际体系的核心；霸权主义仍然是国际和平的最主要威胁；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严重影响第三世界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进程；中国主张要在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3) 关于全球化的认识。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要大于挑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它们及垄断财团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难以改变其边缘和外围的属性；全球化不是西方化，各国发展道路存在多样性；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是冲突和战争的一个制约因素，但是它也导致全球风险的提高。(4) 主权和人权问题。主权仍然是国际社会秩序的基石；人权的含义是丰富的，特别是中国主张的第三代人权观，强调集体人权和发展权是人权的重要属性之一；国际社会应该谨慎对待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正当性一旦确认，会威胁到国际秩序的基础。(5) 和平发展理论。和平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6) 和谐世界理论。中国主张建立一个平等民主、互利共赢、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世界；和谐世界秩序建立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基础上；建立和谐世界，需要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① (7) 中国模式。(见“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部分。)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生命力是常新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思想、社会批判理论、民族宗教学说、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批判、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论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形式与后果的分析，等等，均有不可消解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解

^①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1 部分，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释力”。^①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暴露金融资本主义的弊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解释价值。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大规模地被引进到中国，倪世雄和王逸舟的两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代表性教科书及其广泛发行，充分说明了两位学者在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②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数量大。根据统计，从1991年至2007年，仅五家出版社就出版了86本国际关系理论翻译著作。^③如果计上其他出版社（例如新华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这个数量应该更大，绝不少于150本。第二，范围广。国际关系理论属于新兴的一门学科，即便在西方，积累下来的著作数量并不很大，分支领域并不很多。根据笔者对英语文献的接触，以西方大学国际关系理论必读书目算的话，我们发现几乎大部分英语类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都被介绍到国内。按照领域来分，这些著作分属西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区域主义、后现代理论、战略研究、外交理论和外交史、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第三，速度快。国内对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引进速度很快，许多著作几乎是同步引进。这个特点也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相比，能够更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建构主义理论在国内的引进和迅猛发展。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正面影响是主要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非

^① 见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② 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这五家出版社分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数据来源于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17页。

常落后，急需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为了缩小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距离，了解国外最新研究前沿，引进、分析、批判、吸收西方学说，就非常必要。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规模引进，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活跃。从近2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议题几乎与国际前沿研究同步，即可见一斑，例如人权与主权、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辩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辩论、国际制度理论、软实力问题，等等。

其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开拓了学者和学科视野，也促使中国学者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更辩证地看待西方理论的优缺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民族主义、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中国威胁论、大国崛起理论等的辩论，充分说明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吸收是理性和辩证的，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这些年中国国际关系学术论著来看，西方理论的引进还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规范，表现在问题的切入、研究的过程、方法的选择、论证的逻辑、引证的广泛性、结论的科学性等方面。^①

最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了解国际体系规则和知识，更好地与国际体系打交道提供了智力资源。随着“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以及“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确立，阶级斗争和革命外交退居其后，合作和交流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主流。在这个大背景下，介绍、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必要的。实践证明，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区域主义、多边国际制度外交、应对全球化、民间外交、协商与对话外交等，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当代理论的传统资源

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规模引进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

^① 研究规范的进步可以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丛书”（这是当前国内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研究丛书）以及国内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类杂志（如《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外交评论》、《国际观察》、《国际论坛》、《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科学》）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反映出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类研究丛书很多，但是据笔者观察，能够坚持15年下来持之以恒并形成学术积累效应的好像只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丛书”一家，这种现象与出版社重视、编委会专业、编辑队伍稳定、敬业是分不开的。

世纪以来,一批学者开始整理传统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思想,希望通过对传统的再发现,寻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资源。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出现的“国学热”,特别是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以此为契机,国内出现了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挖掘国际关系理论资源的热潮,发表了一大批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阐述和谐世界的论著。^①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借重的传统伦理政治资源包括:(1)儒家经典如何看待秩序与和平,新儒学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为中国现代化服务;(2)儒家以外诸子百家的伦理和政治思想的借鉴价值;(3)通过对经典的再发现,能否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提供核心概念和解释体系。例如,赵汀阳指出“天下体系”就迥然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秩序的构造方式^②,秦亚青对中国社会中“关系”概念的阐发,促使人们超越“理性”概念来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理论。^③

当代理论的传统资源主要通过三条路径进行发掘:一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传统伦理政治概念解读世界与中国,从传统中发现国际关系理论资源;二是以外来概念重新解读传统中国政治和秩序,赋予传统伦理政治以新含义;三是中西概念相互借鉴,解释世界和中国的经验现象。^④第一种路径或者说“国故派”强调中西概念存在不可通约性,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不能适用于中国历史和现实,要解释中国经验,必须从本土概念出发;第二种路径重视利用西方成熟的社会科学概念解释中国,为熟悉西方理论的学者所喜好,但也常常被人们批判为犯了中国研究中“东方主义”学术不正确的错误。较为成功的是第三种路径,亦即如何利用可以通约的概念,通过对多样性中外世界的反复比对、校订,概括出相对普适的理论解释体系。

国家强盛的时候,人们容易回归传统;国力不振的时候,人们容易扬西抑

^①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政治科学》杂志,发表了多篇古代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思想的论文。根据笔者的统计,从其创刊至今(2006年至2009年第1期),共发表了古代中国国际政治和外交思想论文17篇。

^②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③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④ 秦亚青将这三种路径分别概括为理论建构中的正向格义、反向格义和交互格义。参见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中。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资源能够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但是如何转化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资源，至少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学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王缉思在论到整理中国外交中的文化资源问题时指出：“然而只有通过跨国、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熟悉通用的社会科学标准，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和有力地表达自身特点，作出国际公认的理论探索和贡献。”^①因此，若在整理“国故”中坐井观天，自以为大，对人类其他政治文明进步拒绝接受，即便穷经皓首，难免不浪费心力。

四、“中国特色”与“中国学派”

在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存在一个学科定位和发展问题，这个问题以学界争论较多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或者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标志。^②当然，不应该忽视的是，中国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最近几年都在提要建“中国学派”，气势看上去很大。

早在1987年上海举行的首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③后来对此力倡者为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④“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一度在学术界引起不同看法，持保留看法的学者认为理论无所谓“国家特色”，社会科学理论形成虽然离不开特定的本土经验，但是作为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理论”，应该是超越“国家特色”的。到2005年左右，秦亚青、王逸舟、王正毅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⑤至此，学界关注点从“国际关系理论有无国别特色”逐步转到“中国学

^① 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资中筠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

^② 参考石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争”，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8-545页。

^③ 见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梁守德的文章分别见：“关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和研究对象的探讨”，《国际政治研究》，1991年第4期；“试论中国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⑤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内涵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当然，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中国学派”，双方之间的辩论其实都不反对理论本身的意义，辩论双方都存在强烈的价值需求和理论使命感、急迫感，亦即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可能并非只有一派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双方对于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目标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学派”还延伸到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王缉思强调以中国文化和哲学为基础的中国外交中的思维框架，是认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的关键。^①肖佳灵在有关中国外交研究“本土化”、“中国化”的长文中，对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起点、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思考，提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近现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经典外交文献三大理论源泉中，均衡吸取营养，对中国独特外交实践进行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②的确，中国外交积累了许多独特的经验（如后面所阐述），这类经验如何转化为理论概念，无疑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党的17大报告提出“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命题，在处理国家发展的战略上，特别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性。^③表现在理论研究中，无论“中国特色”还是“中国学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恐怕都回避不了这两个问题：一是章百家和秦亚青主张的如何在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中思考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建设；^④二是能否从学理上提供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体化理论，以形成对传统国内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分裂的超越，并为实践中的国内国际大局的统筹工作^⑤服务。“中国与世

^① 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资中筠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0-305页。

^② 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中国化’：问题与思考”，《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

^③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⑤ 对两个大局统筹的详细阐述，参考令计划：“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建研究》，2007年第11期。。

界的关系”以及“国内国际大局的统筹”这两个一横一纵的问题，表面上是个战略和政策问题，但实质上是个重大理论问题。通过对这两对关系的研究；抽象出核心概念体系，是促进“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生成的最可能途径之一。

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处于发展和转型进程中，国际社会最迫切的议程仍然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议程，而非后工业化议程。这个大背景决定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值得我们进行理论总结、介绍。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1) 政治制度：合作型政党而非竞争型政党关系；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非利益集团民主制。(2) 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制；国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有利于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广泛参与而不是孤立其外。(3) 社会发展：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而非制约关系；扶贫与贫困问题解决；城市化进程；文盲率降低与教育普及化；社会救济制度；粮食问题解决。(4) 对外关系：不干涉内政；维和行动；对外援助；对话与协商外交；人文外交。这些发展经验与西方国家早期甚至现代的现代化历程相比是独特的，对这些经验的理论概括，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组织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建设都是极为必要的。时殷弘认为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关键是中国政治领导人对“中国特性”的坚定信念，^①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恐怕也得有坚定的信念和抱负，将中国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社会的议程或理论。

国际关系研究——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理论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贡献了智力资源，但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知识储备，与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需要还不相称。一个全球性国家，需要广集民智，拥有灿烂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深厚的知识储备，才能为世界秩序规划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新贡献。

^① 时殷弘：“传统内外的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外政策及其中国特性”，《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7页。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for China. The policy is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create stable periphery, and to build up friendly neighboring relations. Thanks to the evolu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 at once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vis-à-vis its neighbors, and carries out strategic change. China has successfully realized its goals for a better periphery in the 21st century to contribute to its general foreign relations and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Sixty Years of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towards Developing Countries

LIU Zhongmin

China's strategy towards developing countries over the three decades before the outset of reform and open policy mainly includes: China supports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caus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fights for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new order; provi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free economic aids; and supports unity and coope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Over the three decades thereafter, the strateg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mainly includes: "stand by the third world forever" but never take the lead; not to "take ideology as a diplomatic line"; commits to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with all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ifts to mutual benefit and co-development from the previously unilateral economic aids; and carries out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is active in participating in addressing international hotspots.

Contemporary Chinese IR Theories: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SU Changhe

This essay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IR theories since 1990s. China was dominated by Marxist IR theory and ideological theory.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IR theories provides Chinese scholars with multi-perspectives.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scholars are increasingly drawing upon ancient Chinese ethics and political thinking. The recent debate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 of IR theories and Chinese School in IR theories reflects the academic appealing on constructing Chinese IR theories, which contributes to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the world.